

The  
Frontier of  
Literature  
No.8

文学前沿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 / 主办



The  
Frontier of  
Literature  
No. 8

文学前沿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 / 主办

学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学前沿(第8辑)/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主办,左东岭主编.

-北京:学苑出版社,2004.8

ISBN 7-80060-341-5

I.文… II.①首…②左…III.文学理论 IV.1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4)第095787号

出版发行:学苑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丰台区南方庄2号院1号楼

邮政编码:100078

网 址:[www.book001.com](http://www.book001.com)

电子信箱:[xueyuan@public.bta.net.cn](mailto:xueyuan@public.bta.net.cn)

销售电话:010-67675512、67602949、67678944

经 销:新华书店经销

印 刷:三河市文化局灵山红旗印刷厂

开 本:965×1270 1/16

印 张:20.25

字 数:280千字

版 次:2004年10月北京第1版

印 次:2004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 数:1-1000册

定 价:24.00元

## 思想性/学术性/前沿性

### 《文学前沿》学术委员会

(以姓氏笔画排序)

主任:钱中文 袁行霈  
委员:王一川 王元骧 王先霈 王岳川  
王逢振 叶嘉莹 朱立元 吴中杰  
吴思敬 李炳海 林毓生 周策纵  
杨义 张炯 张燕瑾 陈炎  
陈伯海 陆贵山 罗钢 罗宗强  
金元浦 项楚 胡经之 饶芃子  
段启明 费振刚 赵宪章 赵敏俐  
徐公持 盛宁 黄天骥 郭志刚  
曹顺庆 曾繁仁 童庆炳 蒋述卓  
董乃斌 葛晓音

### 《文学前沿》编辑部

主编:左东岭

副主编:王德胜(常务) 邓小军 吴相洲 陶东风

责任编辑:汪龙麟 陶礼天 魏家川

## 目 录

- 劳承万 学术主体的知识结构和思维方式(1)  
刘士林 古典学术研究范式反思三题(10)  
——以庄学研究为个案
- 朱寿兴 日常化写作与人的美感性存在(19)  
徐艳蕊 另一种玫瑰寓言(42)  
——关于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推论种种
- [美]马克·波斯特 鲍德里亚对马克思的批判及其问题(52)  
——《生产之镜》译者前言
- [美]鲁伊克·华康德 布迪厄的自杀论(62)  
孟繁华等 关于“韩流”(67)  
——中韩文化交流及“韩流”在中国研讨会纪要
- 张义宾 关于人的美学思考(二则)(82)  
陈 浩 论现代活力形式理论的起源(88)  
李 健 形神创造与艺术本真(97)  
黄健云 浅论审美移情的方法和艺术功能(106)  
王向峰 畸型之恋的母题与悲剧冲突(115)
- 朱嘉雯 台湾女性散文与流亡书写(129)  
——以徐钟佩、罗兰为个案分析
- 王 科 引领跋涉者在暗夜奋勇前行(144)  
——有感《鲁迅日记》中的萧军书写
- 陶礼天 刘勰的“美感”论(152)  
——《文心雕龙》与佛经传译中的“味”论
- [韩]河姬和 道家思想对文人画的影响(171)  
王慧玉 王充文学接受思想初探(177)

- 黄佳佳 谢朓咏物诗简论(185)
- 陈友冰 民族和解的历史见证和胡汉交融的典型诗例(194)  
——对北朝乐府《敕勒歌》的另类解读
- 马东瑶 诗意的交流(209)  
——论苏门文人集团的唱酬之作
- 仲冬梅 以诗为词与以赋为词(223)  
——论东坡词之“破体”
- 田玉琪 吴文英词的句法风格(235)
- 陈玉兰 清代闺阁诗人的崛起及其对寒士诗群的影响(243)
- 房瑞丽 出土文献与《诗经》研究(261)
- 张人和 昭君出塞故事的演变(275)
- [韩]宋琬培 关汉卿戏剧对儒学的疏离和弱化(282)
- 陈国军 李昌祺《剪灯新话》的创作动因与实绩(292)
- 李忠明 清初书坊嘯花轩刊印小说考论(307)

## Contents

Lao Chengwan	The Intellectual Structure of Academic Subjectivity and Mode of Thinking(1)
Liu Shilin	Three Essays on the Norms of Classic Studies; The Case of Zhuangzi Study(10)
Zhu Shouxing	Everyday Writing and the Existence of the Human Aesthetic(19)
Xu Yanrui	On the Aesthetic of Everyday Life(42)
Mark Poster	J. Baudrillard's Critique of Marx and Its Problems(52)
Meng Fanhua et al.	A Survey of the Symposium on Sino - Korean Cultural Exchange and Korean Culture in China(67)
Zhang Yibin	Two Essays on the Aesthetics of Man(82)
Chen Hao	On the Origin of Modern Dynamic Formal Theory(88)
Li Jian	On Formal and Spiritual Creation and the Authenticity of Art(97)
Huang Jianyun	On the Method of Aesthetic Empath and the Function of Art(106)
Wang Xiangfeng	The Motif of Abnormal Love and the Tragic Conflict(115)
Chu Chia - wen	Female Prose in Taiwan and Diasporic Writing: The Cases of Chung Pei - yu and Luo Lan(129)

- Wang Ke Guiding Pioneers Marching in Darkness: On the  
Description of Xiao Jun in *The Diary of Lu Xun* (144)
- Tao Litian On Liu Xie's Theory of the "Aesthetic" (152)
- Ha Jung - Hwa The Influence of Daoism on  
Literati's Painting (171)
- Wang Huiyu A Preliminary Exploration of Wang Chong's  
Idea of Literary Reception (177)
- Huang Jiajia On Xie Tao's Poetry of  
Eulogizing Things (185)
- Chen Youbing The Historical Testimony of National  
Harmony and Typical Poetical Example of the Reconciliation  
between the Han and Minority Nations (194)
- Ma Dongyao Poetic Exchange (209)
- Zhong Dongmei With Poetry as Ci and with Fu as Ci (223)
- Tian Yuqi On the Syntactical Structure  
of Wu Wenying's Ci (235)
- Chen Yulan The Rise of the Boudoir Poets in the  
Qing Dynasty and Their Influence on the  
Intellectual Poets (243)
- Fang Ruili Unearthed Documents and Studies of  
*Book of Poetry* (261)
- Zhang Renhe The Evolution of the Story of Wang  
Zhaojun's Leaving the Frontier - Camps (275)
- Song Wanpei The Effect of Estrangement and Weakening  
of Guan Hanqing's Drama on Confucianism (282)
- Che Guojin The Creative Motivation of Li Changqi's  
*New Stories of Light - Cutting* and Its Achievements (292)
- Li Zhongming On the Origin of the Fiction Printed  
by Xiaohua Xuan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307)



# 学术主体的知识 结构和思维方式

劳承万

学术建设及其原创性的发生,直接来源于学术主体的个人。下面分别就学术主体是知识结构和思维方式等方面的问题略抒己见,以期对当代学术的理论创新能够起到某种积极的作用。

## 1. 大脑功能的严酷洗礼

真正的学术迈步,与学术原创性的发生,除了主体要有“精神支柱”之外,还有一个大脑功能、机制(连及思维方式)的问题。“习惯成自然”,一切(好的、坏的)都会成为“传统”。人云亦云,平庸思想的来回搬运,思维方式的死气沉沉,“三人成虎”的虚假故事……使当今的学界难以伸腰,也难以与“问题”对话。

从“大脑功能、机制”方面开刀,这似乎多是西方人的“手术”,因为他们历来所重者是“认识论”问题。康德的“先验批判”,早已闻名遐迩,近有年青学者刘士林君所著《先验批判》(上海三联出版社)足可为鉴,于此从略。笔者想反思一下文艺复兴之后,西方哲学家如何首开康德先例,要在人的大脑中打扫旧世界的“牛栏”。请看培根的“四假相”(“四幻象”)说。

培根认为大脑中的一切错误的意见、偏见或幻象(假相),其有四种:“(一)种族的幻象(idolatribus)是人类头脑的本性所固有的,其中有终极因(目的论)的概念和把人的愿望加给自然的习惯。(二)洞穴(Specus)的幻象是个别的人所特有的,这是由于他有特殊的性格、教育和交往,由于他所读的书籍和所崇拜的

权威,如此等等。(三)市场(*fori*)的幻象是最繁杂的一种,因词语和名称的联想而起。词语常常被用来作不存在事物的名称,或者作现实事物的名称,但是混乱、定义含糊,由事物仓促抽绎而成。(四)剧场(*theatri*)的幻象出自错误的理论或哲学,出自被歪曲了的论证规律”。<sup>①</sup>

“种族幻象”和“洞穴幻象”,多由人的出身和个性、喜爱带来,这是很自然的事,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都很难克服这两种人类所固有的幻象。但最麻烦者,还是“市场幻象”与“剧场幻象”。前者仅是人类第二信号系统所发生的问题,或说是日常生活中“词语学”与“逻辑学”的问题;后者则纯属思想理论和思想方式方面的问题。四种幻象分属两个层面,即深层与表层(一、二幻象属于深层方面,三四幻象属于表层方面)。不管是哪一方面,对我们当今的学术界,都有现实的借鉴意义,尤其是三、四幻象。比如八十年初期,关于哲学三范畴论(感性——知性——理性)的讨论便是如此。本来哲学三范畴论,是康德先验批判哲学的拱心石,也是康德对哲学的伟大贡献与推进,它打破、并清理了二范畴论(感生——理性)的老框框,显示了主体性哲学的伟大胜利。“知性”和“理性”是有巨大区别的,前者纯属一般知识规律问题,后者在前者基础上进向形而上图式与人文世界(故康德又把“理性”区分为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后者的品格高于前者)。康德把知性从传统“理性”中分离出来,使“先验逻辑”成为可能(也使先验范畴成为可能)。人类认识的直接开端和图式是“感性—知性”,而不是“感性—理性”。康德的三范畴论在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黑格尔那里,得到了广泛的运用,这是人所共知的。黑格尔有句名言:“知性不能掌握美”,中国美学界大约也是有口皆碑了。以三范畴论代替二范畴论,并不是什么深奥问题,也简直可以说是常识。但讨论终于“虎头蛇尾”,甚至可以说连“尾”都不见。据说原因有二:一是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中,从头到尾都没有所谓三范畴,有的只是二范畴(感性——理性);二是讨论的时代背景,刚好是“精神污染”。以“三”代“二”是否属于“污染”?“捕风捉影”、“杯弯蛇影”、“神学运动”……都夹杂在一起了。这是何等脆弱的学术界。

以上仅举一例,其余“幻象”尚多。由此足见,借鉴西方认识

论发生、发展和转折的历史,对我们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其中,不管是康德还是培根,大凡西方在大转型的时代,都有推进新时代发展的深刻精神和锐利武器。在我们这里就恰恰缺乏这一环。21世纪的钟声一敲响,人们都如小孩子一般穿着年节的礼服,大放鞭炮,一片欢呼声,喜贺“新世纪”的降临;或者是“开夜车”,赶写前一世纪的“皆大喜欢”的总结报告……我们的老祖宗早就有珍贵家训:“居安思危”、“未雨绸缪”、“有备无患”等等,但我们似乎早已忘却!至于扁鹊见蔡桓公的情况(劝戒),也颇有参考借鉴意义。然而,不屑一顾。

话绕回来。培根的“四幻象”说,对我们颇有借鉴意义。但认真分判起来,远不及康德之深刻。康德的先验批判是建基于一个共同的相关结构“感性——知性”之中,感性提供材料,知性(人类大脑)提供先验范畴。有前者而无后者则“盲”,有后者而无前者则“空”。那英国经验主义的不朽与大陆理性主义的神圣,都汇聚在这个相关结构中。康德的一把双刃剑,分别割掉了双方的“敌对”性(各自的短处和盲点)。康德是从人类大脑机制的最关键处开刀的。培根是康德两百多年前的前辈,他的“发现”,只能围绕大脑机制的大范围旋转。究其实,四幻象说,实际是“习俗说”(尤其三、四幻象),尚未触到“大脑机制”的主要部件。尽管如此,培根还是把批判的刀剑,引向了“大脑”(大脑幻象/大脑假相)。这是一种深刻的、向内的自我否定与批判。

## 2. 知识结构的追求与完善

“知识结构”是学术主体的“功能”结构,它在“主体”与“客体”相互运动中,趋向完备,并能使研究对象“适应”主体。这种主客体相互适应的关系,正是客体世界与主体世界(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得以同步发展的根本动力与图式。因而,知识结构问题的提出,并不是某人的主观愿望,而是学术主体在研究客体世界中的一种“反应”与规定,那是一种客观的要求。只有严格遵循这种“反应”与规定,主客体之间才会发生良性的循环关系。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阶段(环节)中,就充分地展示了“知识结构”问题的重要性。有清一代的学术出发点(或主流),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念》一书中,归结为一句话:即对宋明理学的一大反动。宋明理学是义理之学,本质上也是对汉代经学(训诂与考

据)的反动。这是学术思维中的两大极端。其实,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也必然要求两端的和谐与平衡,才能显出其光辉与结构之合理。此外,不管是义理或考据,又都必须体现于辞章(载体)之中,否则便无所依附(汉赋的出现,是辞章的胜利)。因而,中国传统文化发展到近代,其知识结构的基本构架便现实地被提出来了,此即:“考据—辞章—义理”三维一体结构。关于这个问题,章学诚、姚鼐、戴震、段玉裁等学者,都严肃地提了出来,且章氏把“识”提高到“德”的地位。

章学诚在《文史通义·答沈枫堦论学》中说:“由风尚之所成言之,曰考订、词章、义理;由吾人之所具言之,财才、学、识也;由童蒙之初启言之,则记性、作性、悟性也。考订之于学,辞章之于才,义理之于识……,记性积而成学,作性扩而成才,悟性达而为识。”章学诚不但见出“考订—词章—义理”的一体性结构,而且还见出其相应的主体能力,即对应于“学—才—识”或“记性—作性—悟性”的能力。需要强调的是:章氏对刘知几的“三长”说,最不满意的是对“识”的规定,因而章氏补充之,成为“史德”。所谓“史德”,即“春秋”大义,这是中国传统学精神的最高品格。因而,“识”又可引申为一种殉道精神的“胆识”。它是“义理”在个体生命中的升华——“士可杀,而志不可夺”。在清代学者中,对此问题的研究和看法,章学诚的观点,算是较为全面的一个。一代散文大家姚鼐在其《惜抱轩文集·述庵文钞序》中则说:“余尝论学问之事,有三端焉,曰:义理也,考证也,文章也,是三者,苟善用之,则皆足以相济;苟不善用之,则或至于相害……然而,进有言义理之过者,其辞芜杂俚近,如语录而不文;为考证之过者,至繁辞缴绕,而语不可了。当以为文之至美,而反以为病者……”虽然姚氏特重辞章,但他还是全面顾及其余二者。

章氏、姚氏的观点,都是一脉相承的:一是中国传统文化发展中知识结构的基本构架:“学(考证)—才(辞章)—识(义理)”,三维一体,缺少任何一维,都是不行的;二是三者相辅相成,任何一维不能偏于“过”(但“识”必须由“义理”升华为个体生命的胆识,才不至空泛无边);三是“才—学—识”结构必须统一于对“道”的追求,否则便会失去灵魂,所以章氏再三强调:“欲进于学,必先求端于道”,“为学之要,先戒名心;为学之方,求端于道”

(同上书)。<sup>②</sup>

从现代的观点看来,所谓“学(考据)—才(辞章)—识(义理)”,实际分属于两大层面,“考据(学)—辞章(才)”,属于具体的形下方面,而“义理(识)”,属于抽象的形上方面。二者的融合,则是“形下一形上”的统一结构(对应两种不同的思维能力)。由此看来,中国传统文化发展中所提出来的知识结构的基本构架问题,虽分属“才—学—识”三个方面,实质上是“形下一形上”的传统一结构,这正好应合中国人的思想的思维方式;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不离器,道器一体。

从上面“形下一形上”统一体知识结构的要求看来,我们学界也应向这个目标努力,进行“形下一形上”两方面的严格训练。从总体上说,当今学界,“考据—辞章”的形下功夫,从来就缺乏系统而严格的训练,许多人甚至还不知道这么一码事;至于“义理(识)”的形上探求,许多人止于玩弄语言游戏,故弄玄虚,与“殉道”精神不沾边,与西方伟大哲人的“本体探求”也相关很远(侈谈“本体”的人,根本不知康德的“本体”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形下训练,不陷于繁琐;形上探求,不失于空泛与虚无。这才是我们的追求。

每门学科,都有自身的知识结构“谱系树”。从发生、发展到成熟,都显示出婆娑的英姿。在知识结构的“谱系树”中,大凡有两股巨流交汇在一起:民族传统(本土文明)与世界一体化(籍外文明)。缺乏其中任何一面,都是巨大的残缺。君不见:凡大师都是学贯中西古今融合的,在我们这里更是如此。

知识结构两个方面(民族传统文化功底与西方功底)的残缺,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直接的原因是中小学教材体系和大学专业课程设置的缺陷。就中小学教材来说,中国古代文化部分,历来就是微乎其微,即使有所改进,一个高中毕业生也无法读懂一篇秦汉古文(也许理工科大学毕业亦差不了多少)。至于当今大学的中文系的课程设置,几乎是半个世纪一贯制,民族传统文化有一定的比例,但欠严密的系统性和理论的深度远离学术前沿。例如中国文学史的分段课程(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唐宋——元明清——近代),每一段都讲“时代背景”,然后再讲“作家、作品”(作品又分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等等)。如

此讲来,一个大学毕业生无法获得对中国诗歌(中国散文、中国小说……)的整体认识及其特征,有的只是分段后的零碎印象,能否可把“中国诗歌论”(“史——论——作品”的三合一。下同)

“中国散文论”、“中国小说论”、“中国戏剧论”等等来代替那“五段”论呢?在此基础上,再开设一门《中国文化史》,把诗论、散文论、小说论、戏剧论等等专门课程串通起来,并提供深厚的背景理论。笔者曾在大学里当过若干年的中文系主任,广泛征求意见时,一片赞成声,但实行起来时大家都苦皱眉头。因为这种“体裁”论,不是一篇论文,而是颇有深广度和前沿性的“史——论——作品”的三维递进的“庞然大物”。“史”(以“诗”为例),就是中国诗歌的发展史;“论”,就是关于中国诗歌的理论(必须渗入当代外国诗学理论作为直接参照);“作品”,就是对各时代、各类型作家的代表作进行合度的分析(吸取当代外国的“文本”理论)。如此一来,教师一身三任:既为“史”家,又是“理论家”,还得是作品分析家。看来,似是超范围、超负荷了。一位名牌大学的中文系主任对我说:你的设想甚好,学生也会因此而得到真知识,真本领。但你想如此一来,有的教师是会打烂饭碗的吗?然后此系主任果断的说:新成立的大学不妨一试,也许行得通;但老牌大学绝对行不通。例如,我校某某老先生,一辈子都是吃的“魏晋”一碗饭,其他“饭”他愿吃么?他能吃么?只好作罢。新想法,竟成了乌托邦。在中国是“文史哲”不分家,住在这个“家”里,何时才能成为“主人”,并能说出几句有份量的话来?至于中文系学生的哲学、心理学知识,离现当代的专业要求实在太远,难以负荷“哲学——心理学——文艺学(或美学)”三维一体的“现代化”要求。所以在学术上只能零打碎敲“吹糠见米”,而要“挖井及泉”成为大家,则是难上难了!大家课程设置如果不按照现代“知识谱系树”的要求进行彻底改造,老是几十年一贯制,何谈学术?何谈学术原创性?

### 3. 追求学术研究(理论)的个性比

文艺创作要求个性化,学术研究、学术理论也应该个性化。按人类造物的本质来看(马克思说“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造型”),“个性化”是“造物”(造型)的主体烙印。创造的生命在产品的“个性化”中闪光,因而“个性化”总是和“创造”联在一起。

抄袭的理论、御用的理论、平庸的理论、应景的理论……能有真正的“学术个性”么？如果有，那也仅是“抄袭”的个性，“御用”的个性，“平庸”的个性，“应景”的个性。那和“学术个性”完全是两码事。前者是一种“丑”，后者是一种美。略作比喻，则是：前者是“东施效颦”，后者才是西施的自然显现的“颦”。本来“颦”和“效颦”都在一个路向上，尚残存一丝半缕的良好动机（追求西施式的美），然而，“抄袭、御用、平庸、应景”等“个性”则全是一种丑，纯粹的丑。

大凡学术大师，都有突出而鲜明的学术个性。请看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是怎样地把自己的学术个性与康有为相比较的。“启超与康有为最相反之一点，有为太有成见，启超太无成见，其应事也有然，却治学也有然。有为常言：‘吾学三十岁已成，此后不复有进，亦不必有进。’启超不然，常自觉其学未成，且忧其不成，数十年在彷徨求索中。故有为之学，在今日可以论定；启超之学，则未能论定。然后超以太无成见之故，往往徇物而夺其所守，其有为之学，在今日可以论定；启超之学，则未能论定。然启超以太无成见之故，往往徇物而夺其所守，其创造力不逮有为，殆可断言矣。启超‘学问欲’极炽，其所嗜之种类亦繁杂，繁治一业，则沉溺焉，集中精力，尽抛其他；历若干时日，移于他业，则又抛其所治者。以集中精力故，故常有所得；以移时而抛故，故人焉而不深”。

康、梁二氏都是学术大师，且生活在基本相同的时代和地域，但由于学术个性之不同（“太有成见”与“太无成见”/—举天成与“学问欲”的自我燃烧……），显现了学术理论上完全相异的景观（当然，学术个性与人的世界观是不分离的，这里从略）。这说明，只有那具有鲜明学术个性的体系、理论，才是充满生机的，也才能成为历史的宝贵遗产。

认真读过康德著作和黑格尔著作的人，都能深刻地感觉到他们之间学术个性的巨大差别。康德的智思频仍，理论如潮涌，上下滚动，前后粘连，“剪不断”，“理还乱”，往往头绪万千，一齐婆婆地向人扑来，使人“昏头转向”，这是康德哲学之所以难读、难懂的原因之一。但康德从不掩饰自己的矛盾和困惑，往往在艰难的“爬行”（证论）中，便呼喊起来了（见《判断力批判·导

言》),叫读者深思。这是一个何等虔诚而老实的理论家!而黑格尔则不然,他一旦设立了理论的大框架(正——反——合/绝对精神——人——自然界……),一切部件,杂物都在其间滚转(如洗衣机一般的转动)。在大框架的滚动下,一切都安于其位,各有所得,不存着“矛盾”和“困惑”的问题,读黑格尔的书,只要把握好他的大框架,则势如破竹,比康德好懂多了。所以人们把黑格尔哲学称为绝对的理性主义和逻辑机器(区别于柏拉图的“理念”论)。有人说,两相比较,康德老实,黑格尔有点“狡猾”(当然两人都是德国的伟大哲学家。此处所论,没有丝毫的贬意,仅是学术风格的差异而已)。

学术个性是“理性”向度与“情感”向度交融的产物。前者是“大目标”,是学术主体的安身立命之所,是“殉道”精神的光辉,所以它能把学术主体的整个身心,及情感的万丈深渊,都能掀动和提携起来;后者,是情感的流动,是人格、品性的自然存在,往往成为一种嗜好,一种趣味。理性的光辉与情感的趣味融合起来,则成学术个性。

在现当代的中国学术史上,“学贯中西”的朱光潜先生,其学术个性之鲜明,理论之坦然、透明、是难以企及的高峰。一本《文艺心理学》作为人们学习美学、文艺学的入门书,是任何同类书籍所不可匹敌的,至今仍放射出不灭的光辉。一代散文大师和思想家朱自清是这样评论《文艺心理学》的:“他这书虽然并不忽视重要的哲人学说,可是以‘美感经验’开宗明义,逐步解释种种关联的心理的,以及相伴的生理的作用,自是科学的态度。在这个领域内介绍这个态度的,中国似乎无法例。……你想得知识固可读它,你想得一些情趣或谈资也可读它;如入宝山,你决不会空手回去的。……这部《文艺心理学》写来自具一种‘美’,不是‘高头讲章’,不是教科书,不是咬文嚼字或繁征博引的推理与考据,它步步引你入胜,断不会教你索然释手。……全书文字像行云流水,自在极了。他像谈话似的,一层层领着你走进高深和复杂里去。他这里给你来一个比喻,那里给你来一段故事,有时正经,有时诙谐,不知不觉地跟着他走,不知不觉地到了家”(《文艺心理学·序言》)<sup>④</sup>,朱自清是散文大师,他在上面这段话中,把朱光潜学术(理论)个性,说得异常明白和透彻。朱光潜的书,其



最可贵者,是寓理论研读和追求于“不知不觉”之中,化“负荷”为“享受”,化“理论”为“情趣”,把陌生的学术殿堂化为自己的“家”。这真是学术研究之高标,学术创造之典范也!

在学术个性的问题上,我们还是要认真借鉴王国维。他是哲学和诗双璧辉煌的人,其理性的超绝追求,和热烈情感的爆炸,都混在一起的。所以他把所读的哲学(书),分为“可爱而不可信”、“可信而不可爱”的两大类。且认为:这是人生的最大苦恼!所谓“可爱”,是和情感的爆炸系统联系着;所谓“可信”,是与理性的超绝追求联系着。两者都达到了超越寻常的深度与境界。两者都是“殉道”精神的闪光。王国维贫苦一生,身体弱不禁风,还有衣食住行的无可奈何的“依附”……然而,他却有如此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他的“人生最大苦恼”,不是当下的“衣食住行”,而是超绝的形上境界。作为中国现当代学术的开路者,作为可歌可泣的悲壮的前辈大师,他留给我们当今学术界医治平庸,医治腐败的“灵丹妙药”(遗产),真是太珍贵了!我们每一个有学术良知的人,都应该每日“三省吾身”,吟诵汲取那使人告别黑暗和腐败的诗句——“人生过处唯存悔,知识增时只益疑”。学术主体,只有永远处于追求和超越的无止境过程中,才能抛弃平庸,不陷于腐败。

以上我们从三个方面,论述了学术主体的内在结构与功能,它是当今学术建设,防范平庸与腐败的迫切要求,只有达成广泛的共识,在“殉道”精神的强光下,既知“路漫漫其修远兮”,又“知道人间有羞耻事”,学术原创性之发生才有可能。

#### 注释:

①转自〔美〕梯利《西方哲学史》(增补修订本),289页,商务印书馆,1999。

②这里的“道”已是“史德”的大义了。参见《文史通义·史德》。

③《朱光潜全集》第一卷,安徽教育出版社。

(劳承万,湛江师范学院中文系。邮政编码:524048)